

这些事你应该知道

中共高干谈一些历史真相

目 录

1. 耿飚：长征中飞夺泸定桥是假的
2. 彭德怀秘书王亚志：四渡赤水是悲剧
3. 中监委调查组长李坚：安徽大饥荒饿死 350 万人
4. 中共领导人谈三年大饥荒
5. 杨迪：毛岸英确实因蛋炒饭而牺牲
6. 林克：毛泽东和江青分居真相
7. 刘伯承元帅怕看战争片
8. 朱和平：文革中爷爷挨批真相
9. 尹曙生：安徽大饥荒中人吃人真相
10.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11. 1980 年四千老干部评价毛泽东
12. 廖伯康：四川大饥荒饿死一千万人
13. 刘亚洲：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
14. 吴之理：朝鲜战场上虚惊一场的“美军细菌战”

注：中共历来都强调实事求是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却非易事。尤其是在许多特殊情况下，根本就无法讲述历史的真相。但加入中共的成员中，毕竟有一批确实是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的志士。他们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经过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真切地感受到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真相的重大意义。于是，一些经历或目睹了重大历史事件的高级干部，在舆论管控仍然十分严厉情况下，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通过各种合法或巧妙的渠道，讲述自己亲历或目睹的重大历史事件真相，为后世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史料。他们讲述的历史，显然比官方纯粹为宣传需要介绍的历史可靠得多。对他们罕见的勇气和良心，我们应当表达真诚的敬意。本文集纳其中的一部分，或来自于正规出版的报刊，或来自于本人出版的回忆录，也有一部分广泛流传于网络且官方无法否认也算是一种默认。

耿飚：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假的

人物背景：耿飚，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

（本章选自解放军文艺原副主编刘家驹所著《光荣的背后》一书）

1987 年春，《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追加任务——为耿飚代笔写回忆录。当时，我正给他们编辑王首道、程子华、萧劲光等人的回忆录，同时又担负着写林彪传的任务。对这个追加的任务，我虽然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但在采访耿老的过程中，深感分身乏术。因王长龙是从《解放军文艺》私聘我上马的，我的老摊子不能撒手，于是，我和王商量另找人来给耿代笔。王说：“你不能甩手。”我说：“我会全力协助。”我很快从老部队 12 军借调来孔祥绣，他是我熟悉的作者，文笔是胜任的。孔祥绣是第一次参写大部头，不熟悉战史，在采访过程中，我得陪同协助。耿老不因循守旧，兴之所至，畅谈无忌。一年后，经孔祥绣尽心

竭力的整理成型的书稿，都是遵循“光荣、伟大、正确”这一主旨走笔，凡是影响我军形象的，不管有多真实也决不允许写入史册。耿老的一些不得公之于世的真言只能锁进箱柜。多年后，我重新翻开采访笔记，发现耿老当年所言的负面史实虽是些零星的片段，却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我把它连缀成一篇第一人称的佚闻，其中的“我”就是耿老。

国民党对我中央红军第三次围剿之后，我军遭到重大损失，1933年1月，中央红军在滕田进行了改编，师缩编为团。我原是九师参谋长，安排我到一师二团当了团长。刚上任三个月，又到三团当了参谋长。三团团长是黄永胜，政委邓华，都是刚到职，是他俩提出要我的，我没推辞。三团原是罗炳辉的64师缩编成的，没有多少战斗力。不久，就调我到四团当团长。

四团在井冈山时就是朱德的28团，参加过赣南起义，有很强的战斗力。这个团的团政委是杨成武，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团长了。前任团长肖桃明，在打土围子中牺牲了。他指挥打仗不要命，学人家苏军那一套，冲锋要挺胸昂首，不准卧倒，射击只能立姿，在堑壕里战斗

也要露出半个身子，显示革命者的英勇无畏。谁要是在战场上勾着腰运动，他就在后面给你一枪，大骂你是怕死鬼。他就是直着腰指挥打仗的，敌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督战官，一枪就把他撂倒了。

红军早期，我们的营团长指挥能力有限，战术上不讲章法，往前冲只会一顿猛打，打败了，就放开两腿往回跑。干部的号令也原始，班排长用口令，连长吹哨，团长用号。伤了靠自救，战死就不管了。兵员不足，抓俘虏补充。给养一是靠打土豪，再是向老百姓征粮派款。

红军的巩固虽有政治灌输，主要还是靠严厉的纪律约束。对动摇的，不听号令的，坚决执行战场纪律。杀人是经常的事，它确保了红军的壮大发展。

长征，我们是从于都出发的，一军团担负前卫。那年，我 25 岁，杨成武比我小四岁。我们当团长政委的都不知道这次行动干什么。杨成武是长汀人，和刘亚楼是小同乡，杨在电话里问刘去哪里，干什么？刘回答，你还是个小孩子，不该你知道的事不准问。杨把舌头一伸，对我说，不准问还挨了批，我看这回打出去不

像再回来了。没几天，师后勤发来新枪、弹药、银圆。还是七月天，就发了新棉衣、绑腿，还特地给我和杨成武一人发了条军用毛毯。我知道这是一次远走高飞的行动。

战士情绪很高，觉得老在一块地方转，吃菜吃盐都困难了。老百姓对我们的态度一直不好，我们的吃穿用，都是从他们身上硬派来的，都希望离开。我也装备自己，弄来一双英国的39码半胶鞋（这双鞋我一直穿到陕北），和两件合身的从战场缴获的衣服。

9月下旬的一天，军委半夜来命令，我们开始走上长征路。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赶出红军，孤身独处，林派了一个班去照顾他的生活，还送去二百钢洋。长征开始，毛泽东受到“三人团”的冷落，林彪派出卫队给毛抬轿子。两万五千里的艰苦跋涉，毛在生活上优于张闻天、博古，没吃过多少苦头。打开道州，我们住在天主堂，这里有座仓库，吃的东西很多，我都给看住了。林彪指示我，给毛主席送些吃的去，我一下就准备了十担，每担不少于40斤，派了一个排送去，他们不认识毛主席，放下挑子就回来了。从此以后，每隔十天半月，一军团下

属的团，都要给主席送去一挑从老百姓家弄来的食物，如糖果、糕点、油盐、酒米，还有腊肉、香肠、活鸡、活鱼等，我都要经于检查才送去。这是林彪的规定。

1934 年底，我红四团是二师先头，奉命在猴场强渡乌江。我来到乌江边察看了地形，侦察了敌情，准备找刚负伤归队的杨成武商量渡江方案，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人影。这时陈光师长来了，张云逸局长带工兵连也来了，我们研究准备绑扎 60 个竹排，用一个营的兵力夜间强渡。强渡开始，在机枪和火炮掩护下，几十架竹排直趋对岸，敌人虽有零星的还击，我们很快占领了对岸。有趣的是，军委炮兵连长赵章成信佛，一遇打仗杀生，他就点上香火，抱住八二炮弹祷告上苍：“我赵章成是执行公务，绝非滥杀无辜，死鬼别怨我。”建国后，赵已是军委炮兵副司令。还值得一提的是杨成武，他根本就没在第一线指挥渡河，仅听了我们参加战斗的人的述说。后来，他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添油加醋地大吹特吹，说他是怎样指挥强渡乌江的。

还不止此，他吹开了飞夺泸定桥的神话。

铁索桥的木板桥面已给敌人烧掉了，杨成武和王开湘带四团赶到时，敌人已退走，根本没打，杨、王的任务就是重新在桥上铺门板和树干给后续部队通过。20年后，杨竟然吹出他组织22勇士，冒着敌人火力前仆后继地冲过铁索桥。其实，死的三人是铺桥时不小心掉进大渡河里的。

二渡赤水后，我们去了云南扎西（宣威），全国有名的宣威火腿就出产在这里。我们一军团把四家火腿厂抢得光光的（其中一家还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父亲开办的）。有的战士背了三只火腿。宣威火腿重，一只只有二十斤，天天吃火腿，差不多人人拉稀。离开扎西时，没有敌人追击，提着裤子一天要跑百把里，干部们都骂毛主席瞎指挥。林彪看到下面反映强烈，写信给中央说毛让部队在弓背上跑，拖垮了部队，要他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交权给彭德怀。毛也霸气，为这事在大理会议上批评了林。红军长征一路上，没有后勤补给，要生存只能靠打砸抢。我手中总是拿着根两尺长的铁杆子，只要住进地主家的堂屋，我就用它对着地面或隔墙捅几下，一般都能十拿九稳的找出粮食或金银

细软，我们一路从不愁吃穿。

还有一件是看女人洗澡。一天晚上，参谋来叫我，要我去看稀罕。他带我到地主家的楼上，一间屋里点着灯，还有哗哗的水声。他要我从一条有一指宽的门缝往里看。真是让人稀罕，地主的闺女正坐在木盆里在洗浴，虽只看见光溜溜的上半身，也让人神魂兴奋，那一夜我都没睡好。

彭德怀秘书王亚志：

四渡赤水是悲剧

（王亚志：曾任彭德怀秘书多年，后任周恩来办公室军事参谋，总装备部军职离休干部）

《长征组歌》中有一首“四渡赤水出奇兵”，无论党史、军史都把四渡赤水说成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年谱，以及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则用它来论证毛的军事

天才，在革命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中，四渡赤水则成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永久话题。

四渡赤水前前后后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它在我军史上的影响却是巨大深远的。尽管当时我军没有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但是连遭重创，仅剩下万把人，而军史却把它说成是毛泽东“力挽危局”“拨正船头”的旷世壮举。彭德怀的秘书王亚志用他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遵义会议召开，第一个议题就是前堵后追的红军下一步的走向。几个四川老总（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提出北上“赤化四川”，得到了中央新军委周、毛、王（稼祥）的一致赞成。

但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组织指挥一军团莽莽撞撞地进入赤水的土城。敌人是川军很有战斗力的两个旅，一军团在青岗坡打了整整一天，伤亡两千余人。两门山炮丢进了赤水河，伤员无法抬走。林彪哭了，博古也站出来骂毛的指挥是狭隘的经验主义。退出战场的我军被迫一渡赤水，往西从渡口和江安

两县之间寻求渡口，幸好国民党 50 军军长郭勋祺借口要整顿部队未追，要不我军必成石达开第二。

郭之所以不追，是因为郭早年和陈毅是同学，又和刘伯承、杨固公很有交情，川军刘湘要搜捕共产党，郭派人把陈毅秘密护送到了武汉，让陈毅躲过了一劫。1947 年，已是 15 绥靖副司令的郭勋祺在襄樊被我军俘虏，陈毅念恩图报，释放了郭勋祺。这是后话。

赤化四川已无可能，毛“寻机北渡长江”，又让林彪打叙永。叙永有国民党一个旅守备，防御严密，以逸待劳，结果我们又吃了亏。彭急电中央再不能北渡长江了，他以“伤亡大，落伍多”为由，切望中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党史、军史至今也不敢公示这一电文。红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仓皇逃到云南的扎西（今宣威，当年叫石坎子）休整。一军团缩编为 6 个团，三军团编了四个团，五、九军团各缩编为 3 个团，加上干部团、警卫团 共 18 个团。人数已不足两万人，可毛不甘心，还要“寻机重占遵义”于是，又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

二、红军二渡赤水后，又是一番苦战。三军团的参谋长邓萍牺牲，才再次夺取了王家烈坐镇的遵义城。这时，吴奇伟两个师蜂拥而至，要夺回遵义。红军一三军团全数出动，坚守城外高地。恶战三天三夜，10 团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剑伟牺牲，11 团团长邓国清负伤，12 团政委钟赤兵打断了胳膊，打得三军团四个团每个连只剩下五六十人。正当三军团面临崩溃之时，林彪不顾自己的安全和他担负的正面防御，把一二师的兵力都掉过头来打敌人的后背，迫敌攻击三军团的两个师后退，不但解救了三军团，还出其不意地追击到乌江北岸，打垮了吴奇伟的一个师，俘敌一千多人。这不是毛的“得意之笔”，而是红军被毛置于死地之后林彪的求生之举。林彪顾全大局，解救了红军，让彭老总感激不尽，应大书一笔。一军团的斩获，并不能改变红军的危局——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朱、毛部队不及（两）万人，粮弹两缺，状极疲惫，已无战斗力。”我军遵义保卫战结束时，三军团遭到了从未有过的重大伤亡——10 团、11 团的各个连只能编成 4 个班，12 团编了 5 个班。三军团要军委补充兵员。

想当初，红军第一次进占遵义时，小青年都争当红军，扩红扩了 4000 多人。可第二次到遵义时，人家看到红军死伤这么惨，都不干了。军委哪还有兵员补充给你？！

彭老总预计到敌人会卷土重来，向中央提出，赶快移师秀山、酉阳，靠拢二方面军。毛不理睬。5 月 12 日在会理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把彭的电文拿出来，作为“右倾动摇”的证据，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林彪看出来，毛重占遵义，是想打掉中央军周浑元的纵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这是用鸡蛋去碰石头——周的纵队，无论装备和战斗力都远胜于红军。毛眼大心肥，为了在遵义立足，想一口吃掉周部。

林彪不敢正面冲撞毛，3 月 10 日他给中央发报，提出一军团为主，三军团为协助攻打新打鼓场。彭德怀很支持林彪的建议，新打鼓场只有王家烈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如能吃掉一个整师，既能鼓舞斗志，又会让敌人生畏，还给我军一个喘息的机会。可毛就是不同意。为什么？周恩来在 1972 年 6 月 10 日的中央批判林彪会上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

人一个师守在新打鼓场，大家开会都说要打。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但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大家都不听了，半夜里，毛提着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晚发，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第二天，一起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既然一致通过要打，毛私下找周就改变了主意，周是新“三人团”有最后决定权的人，毛为什么能独角拗众？周至死也没说明个中原因。张闻天的说法就不一样了，攻打新打鼓场，“毛泽东认为是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大家还是坚持要打，有人对毛说，‘少数服从多数，你不干就不干。’我主持会议，通过了打的决定，还撤销了毛的指挥权，前敌指挥由彭德怀暂时代理。第二天开会，同意了毛不打的意见，军委马上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打鼓场的指令》，毛泽东恢复原职，还向我提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即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

张闻天也是在批林批孔时说这番话的，他措辞隐讳，不敢说毛在会上要撻挑子，遭到众人批评，张才决定撤销毛的指挥权的。第二天

开会，张为什么又同意毛不打的意见，还向一三军团发出不打的指令？毛还就势提出成立三人团，这是让张拍板的。张不能说，也不敢说，因文革中毛的权势炙人，张要保护自己。

毛为什么要一意孤行？我找不到历史的真凭实据，但可以从毛的权欲观作出推定，如按他的意图打垮周浑元，在遵义立下足跟，他马上就可以取代张闻天的地位。毛是将将的能人，摆兵布阵远不如彭、林。打周浑元完全是从他个人的政治利益考量的，他没有任何的敌情分析，就让一三军团去“啃硬的”。

一三军团怎样打周浑元呢？3月15日红军总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周有三个师，他的军官都来自中央军校，有良好的军事素质，敌人还派来飞机帮忙，结果像土城之战一样，红军伤亡两千余人，撤出战斗，扔下伤员溃退，仓皇地三渡赤水。

三、鲁班场战斗失利后，彭总又向中央提出，红军应向西南转移，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以寻求战机。毛不听。彭在对中央的电报中多次对毛的指挥提出批评，说是他“攻坚乱碰”，毛都积存于心，秋后算账。四

月，红军渡过北盘江南进，一路上，像惊弓之鸟，一天行军 120 里，不知目的地在何处。有人提议到广西百色，4 月 28 日，在寻甸鲁土村军委开会，再次决定渡过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4 月 29 日，中央军委发稿《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5 月 3 日到 9 日，红军四渡赤水后，又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沿途还补充了新兵 1600 多人。

1935 年 5 月 12 日，在会理城外的一家铁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只主持大计，前敌指挥由彭德怀来担任的建议。毛说，这是缺乏胜利信心和心存怀疑的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是背离遵义会议精神的。

当时，林已领教了毛的指挥，没有任何追兵我军就窜到云南、四川，一个多月的急行军，拖垮了部队，掉队加上逃亡，又是几千人。加之毛指挥打土城、打鲁班场，让他的一军团伤亡了五千多人。林一股怨气爆发了，要毛挪开指挥位置，让懂军事的彭总来指挥。林彪信的原文是：“……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东奔西走，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

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 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林彪当时是借“走了弓背”为由头，写信给张闻天的。那年林彪才 29 岁，毛怀疑是彭和张闻天有勾结，批评林彪说：“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

四 、在 1956 年的八大上，毛泽东只检讨了两句：我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青岗坡）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即 鲁班场——离茅台 20 公里）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1959 年庐山会议批彭时，毛旧事重提，林彪坦然声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我写的信彭不知道。”

早在 1929 年，朱、彭、黄（公略）和毛为前委和军委的权力不断发生争执，文革中有人说是彭要把毛赶出红军，毛是个记小账的人，对彭一直心存芥蒂。彭德怀对毛很坦然，他给我们说过：‘对 鲁班场、土城两次战役，我是不同意打的，结果都没打好。都是背水而战，

还仓促应战，又慌忙撤退。”毛的权欲和猜忌，酿成了红军四渡赤水的悲剧。

摘自刘家驹著作《光荣的背后》

中监委调查组长李坚：

安徽大饥荒饿死 350 万人

(2013 年 09 月 25 日 16:5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注：中国新闻周刊是中国新闻社主办的权威性周刊，所登稿件都比较保守，多以政府正规渠道公布的数据为准。

1957 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 198 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 300 人，中监委大约有 120 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

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

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

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 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 年至 1962 年间，中国总计饿死 3500 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 3500 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

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 1954 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 1965 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

11 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 1 个月。也就是说，我这 10 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 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8 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

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

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

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本来就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

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

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才的老红军向我反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搜集整理的材

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根据这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当时那种惨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 350 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

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 300 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 300 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 1961 年 3、4 月间）正式上报为 300 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可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1969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

动我也不怕。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 350 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 300 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 300 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 350 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 350 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 300 万。★

(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

本刊特约撰稿/米鹤都 载 2013 年 09 月 25 日 16:51 《中国新闻周刊》

中共领导人谈三年大饥荒

毛泽东：

(1) 1961 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毛泽东：“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毛显然是撒谎！

刘少奇：

(1) 刘少奇在 1961 年初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大跃进”期间共中国有三千万人

非正常死亡。(1961 年毛泽东对来访者说：中国没有饥荒)事实上比这还多。专家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测算的结果表明，当时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约有三千八百万，其中主要是饿死、累死的。

(2)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刘源：《中华儿女》1998 年第 10 期）

邓小平：

(1) 邓小平在 1961 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1994 年第 3 期第 219 页。）

(2) 1985 年又说：“1958 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15 页）

杨尚昆：

“(1964 年)2 月 10 日，中央决定我为人口

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周荣鑫、徐子荣为副组长。那时进行人口普查，没有现代化手段，普查项目也比较简单，主要依托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力量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取得了 1964 年 7 月 1 日的人口数据：全国（不包括港、澳、台）人口为 6.9458 亿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 6.0193 亿人增加了近 1 亿人。但是在普查中发现，1960 年底全国人口为 6.6207 亿人，比 1959 年底减少约 1000 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4.57%，其中县以下自然增长率为 -9.23%。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当时统计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却大体上反映了那时部分农村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况。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

（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的 20 年）

万里：

（1）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

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 1998 年 4 月 30 日《中国经济时报》）

李先念：

1960 年夏李先念到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 17000 多人，他都没有流泪，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大饥荒年代的“信阳事件”）

薄一波：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 1959 年 4 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 2517 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714 页。）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 1959—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

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谨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田纪云：

（1）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杨迪：

毛岸英确实因蛋炒饭而牺牲

（杨迪：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参谋长，曾任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此文是其儿子所写。）

—

近来有关毛岸英之死的议论，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热火朝天。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热衷争论的人们似乎对毛岸英生平事迹并不感兴趣，而只盯着一个“蛋炒饭”炒来炒去，令人匪夷所思。

本人对这个“蛋炒饭”的争论本不感兴趣，毛岸英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是光荣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上，这是铁定的事实，有什么可争的呢？可是现在的闲人们竟然为一些本不是问题的枝节小叶争吵不休，让已经牺牲几十年的烈士无以安息。更有甚者，本来是探究烈士牺牲的经过，却演变成了吵架，演变成

了相互的攻击、谩骂和侮辱，而且涉及到了很多无辜的当事者和见证人，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我的父亲杨迪不幸也成了被辱骂，被侮辱的对象，做为他的儿子，我觉得我就应当说点什么了。

二

有人认为，“杨迪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中，关于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描绘，正是网上大量“因炒鸡蛋饭被敌机轰炸致死”一说的来源”。

那我们就来看看杨迪是怎么说的：

“第二天（即 1950 年 11 月 25 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 对我说：

“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三人中我

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这是不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呢？让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判断一下吧。

1. 我第一次知道毛岸英牺牲的具体情形，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更早），当时正值文化革命大动荡的高潮时期，亿万军民对毛泽东连同其活着的或已去世的亲属的崇敬心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上各种关于党史人物的故事广泛传播，其中就有关于毛岸英的种种传言。就此我询问了曾在志司工作战斗过的父亲杨迪，他向我讲了有关情况（与二十多年后他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完全一致）。从此，毛烈士牺牲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使我以后每每在听到相关的不确切议论时，即以父亲的讲述予以纠正。

一贯在政治上非常谨慎小心的杨迪，能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之又紧的时候，无所顾忌地向我讲述毛岸英的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讲之事是事实；二是在这个事实中没有丝毫地对毛的不尊重，更不会是贬损。否则，他哪担得起由此引起的“立场问题”呢？

2. 1984年，我到内蒙古（那时是划归辽宁省的）翁牛特旗去看望父亲在朝鲜时的老警卫员孙连元，其间我向他问起毛岸英的牺牲经过（没有任何启发诱导），老人以非常沉稳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讲了他所知道的故事，听后，我不禁脱口而出：你和我爸讲的一模一样。

这是个离开部队已经三十多年，在偏远的贫困中挣扎的老农民，但对当年在志司在自己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原汁原味。因为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几乎没能再接触到当年的首长、战友，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他的记忆是原始的，不带诸多政治派系的考虑和功利的色彩，他自然流畅地讲出当年的事情，且与杨迪的说法不谋而合，实在让

人不能不相信，还是在五十多年前的朝鲜时，志司的官兵们就都已经知道“蛋炒饭”的故事了。

3. 1985年5月6日，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向来访者介绍了志愿军总部被炸和毛岸英遇难的情况。

他说：“十时许，美军飞机临空，没有绕圈子，一来就投弹，而且是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瞬时烈焰冲天，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欣，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不幸牺牲。”

这是25年前在成都军区任职的丁甘如的讲述，其中明确地指出了毛岸英牺牲时是在“炒饭吃”。

4. 杨迪的书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行笔始于1997年3月，成书出版于1998年9月，书中关于毛岸英牺牲的讲述，和作者二十多年前对我讲的别无二致。

杨迪的书是经过有关机关的审批，通过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向社会出版发行的。如果他对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讲述有不实之处，有贬损的话，那么他将无法面对当时仍旧活在世上

的老首长、老战友，还有毛家的亲人。以杨迪的处世为人，是绝对不会为讲一段故事而让自己成为漩涡中心，更不愿出现现如今这种“混战”的局面的。

另外，该书出版至今已有 12 年之久，除了在市场上公开发行销售了两万多册以外，光是杨迪赠送给当年志司的老首长、老战友的（包括网上经常见到的几个名字），就有一百多册。然而，为什么那时那些仍然健在，并且一直与杨迪有着联系的当事人、知情人没有提出“异议”呢？为什么没有出来说说说他们经历的或知道的“真相”呢？

答案只有一个：事情大致如此，杨迪说的没错儿。

而且这还可以说明，“炒鸡蛋”的事情在那些老将军、老机关、老参谋们的眼里，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件“事儿”（原因后面再讲）。

5. 杨迪的述说以及他亲笔撰写的一百多万字的著作（除《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外，还有《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和《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两部著作），凭借的不仅仅是自己十分聪慧，记忆惊人的头脑，更有他白纸黑字的

“作战日记”为依托（参看《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的扉页照片；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现分别保存在军事科学院、总参作战部和沈阳军区司令部）。如果说人的记忆有差错，但是那些即时的战地日记，是不会随大脑老化、世道变迁和人情世故而改变的。

6. 至于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并依据志司给军委的电报，指出这是杨迪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十分关键的错误”，并“试问杨迪及其回忆录的捉刀者：在这样重要的地方（人数）发生了如此低极的史实谬误，你们让人怎么相信你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卷首语中说：“……将我经历的历史，如实地按当时的情况写出来，只写我亲自做的和耳闻目睹的第一手的真情实况。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也应该是对……后人负责。”所以杨迪在书中述说的，只是他亲自做的和亲眼看到的情节，他没看到的事情，他不会杜撰。他看到了房间里有三个人：成普、彭总的俄文翻译和新调来的参谋在“蛋炒饭”，就说了三个人的事儿。至于

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那是别人看见的，而不是杨迪的“低极的史实谬误”，因为从杨迪离开到美机轰炸，其间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有何人到过彭总的办公室，做什么事情，他无从知晓。

7. 除了杨迪和丁甘如的述说，近两年来还有杨凤安（时任彭总的秘书）、成普（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毛、高牺牲现场的目击人之一）和赵南起（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朝鲜语翻译）等几位知情人、当事人在公开场合讲述了有关毛岸英之死的情况。其中杨凤安和赵南起都说到毛岸英二人牺牲时是在“热饭”、“弄饭吃”，而成普则没有提到吃饭的问题，只是含混地说“作战室没有鸡蛋，也没有炊具”，似乎间接地否定了“弄饭”说。

其实，如果他们在屋里没有“蛋炒饭”，成普就应当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当志司所有的人按规定去防空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屋里干什么呢？

我们知道，杨迪在书中不仅准确地说到彭总屋内鸡蛋的来源，还记述有详细的和成普关于“蛋炒饭”的对话。我觉得杨迪不可能凭空

编出那么生动具体的一段对话，而且对话的对象还是出书时仍然活在世上的真名实姓的战友，那不是找“事儿”嘛。

对此成普也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成说到的“作战室”，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发生不幸的地点是“彭总的办公室”，而不是“作战室”，两者是有很区别的。作战室是志愿军司令机关众多人员实施作业，指挥战事的地方，是大型场合，这里可能不会有炊具，一般也不会有床铺。而彭总的办公室则不仅是彭总办公的地方，也是彭总生活、休息的地方，是小型场合。在这里本来就备有冬天取暖的小炉子，顺便再备几件炊具和油盐酱醋之类，那是再应该，再正常不过的了。更何况在战争年代，什么东西不能用来代替炊具呢？脸盆、饭盆、饭盒、茶缸，甚至钢盔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毛岸英们正是熟知彭总办公室的“秘密”，才会到那里去弄饭吃，合情合理。

成普间接否定“弄饭”，说服力不足。

喏，至此肯定与“间接否定”成四比零点五状，信谁？

8. 当年志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只首长

要过问事情的原委，就是一般的干部战士也都会打听“怎么回事儿”。所以，首长们得到的即时报告，绝对应当是准确的，一致的。以当时丁甘如（作战处处长）、杨迪（作战处副处长）、杨凤安（彭总的秘书）、成普（作战处副处长）等四人的身份、职务，不可能有众口不一的汇报，他们的汇报内容应当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而且之后传遍志司官兵的事件经过，也一定是同样的版本（孙连元的讲述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杨迪的讲述的是他亲眼所见，不含褒贬，只是事实，且前后几十年是一致的，符合逻辑的。再辅以丁甘如、杨凤安、赵南起、孙连元等人的旁证，杨迪做出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的结论，客观，坦诚，真实，是经得起历史的考证的。

三

按说我们为杨迪讲述的解析就是以上这些了，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流传网间，其中有误解，也有无知，不妨在此

顺带做个解释和说明。

1. 关于战时司令机关的作息

为什么要说说这个似乎不相干的话题呢？主要是因为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中，还牵扯到毛“没有按时起床”，“早饭未赶得上吃”，“好睡懒觉”等等说辞。说句公道话，上述这些表现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战时司令机关是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战况紧急，首长随时要情况、下指示、发命令，整个机关完全是依着战况围着首长转，常常是通宵达旦，甚至是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极为辛苦。于是睡觉、吃饭就是忙里偷闲的头等大事，稍得闲暇，不是赶紧睡一觉，就是赶紧寻摸点儿吃食填饱肚子。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任务又来了，不吃不睡连轴转，任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毛岸英“起床晚了”，“没能和大家一起吃上早饭”，“和高、成一块儿到彭总的屋内弄点儿蛋炒饭”根本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更不是错误。如果说毛岸英“蛋炒饭”不合适宜，那彭总、洪总与此同时的对弈又怎么讲呢？真奇怪，为什么现在人们紧盯着“蛋炒饭”不放，炒来炒去，少见多怪，没有一点意义。

2. 毛岸英的过失在于私自出洞下山

11月24日志司上空发现美机后，就发布了防空号令，要求志司机关的所有人员第二天：“一. 拂晓后一律不准升火冒烟；二. 拂晓前所有人员必须吃完早饭并进入防空洞躲避……”，这防空号令就是纪律。

可是，毛岸英等却出洞下山了，所以归根结底，毛等人“弄吃的”不是错误，但枉顾防空纪律出洞下山就不妥当了，这才是毛岸英和高瑞欣二人悲剧的根本原因。

3. 关于“处理急件”和“抢救文件资料”

有说毛岸英下山前在“处理急件，然后……”云云，我说这与毛“弄饭吃”乃至被炸身亡的事情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处理急件”应该是在山洞，“弄饭吃”是在山下房屋，两个行为在时间、空间上均不搭脊。此说应与主题无关。

如果有人坚持“处理急件”说，那他是在处理什么“急件”呢？我们知道，战时首长司令机关的紧急文件，一般为军令、情报和内部上下级往来的电文，它们分别是由作战部门，情报（侦查）部门和机要通信部门负责。毛当时的职务是“俄文翻译”，与上述部门并无直接

的职责联系，而且志司与苏联方面也没有直接的俄文电报往来（所有与苏联有关的事宜，要么经过中国国内转达，要么由苏联驻朝代表与志司面洽，毛岸英的用场即在于此），所以，志司没有必须由毛岸英处理的“急件”。

另外，杨凤安在 2004 年《时代潮》第 19 期中说：“办公室的成员对他（指毛岸英）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请注意 2004 这个年份，那时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尚未开始，杨凤安说话的心态应该是很自然、很平和的，还不会受“舆论”的干扰。

还有，当年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后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将军，在所著《在志愿军总部的日日夜夜》一书中也说到，毛岸英在（牺牲）那一天，没有被安排值班任务（该书第 94 页）。

在某电视剧中所描述的，毛是“为抢救机密文件”而下山，而牺牲。可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彭总身边有那么多秘书、参谋、干事、警卫人员，他们在进行防空准备的时候，一定会把所有的文件资料都收拾好（此

时没有空袭警报，应当很从容)，带到安全的地点，决不会遗落什么而让毛岸英在美机临空的时候，去抢救，去牺牲的。剧中的描述不仅不是事情的真实景况，而且有肆意贬低彭办其他同志之嫌。

再说，如果毛岸英等真是为抢救重要文件资料而致牺牲，志司的领导机关及其直属的政治部门理应为他们评功授奖，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过任何关于毛高二人立功授奖的信息。

无中生有、画蛇添足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故事的可信度愈发不足。

4. 关于躲避炸弹的常识

在杨迪与成普的对话中，是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因而被烧死的。有人对这个说法甚为不满，说它“不但经不起推敲而且很恶劣可鄙”，进而认定“这（说法）和成普无关。极有可能是杨迪本人或者捉刀代笔的文人的编造”。真有意思，明明话从成普口中出，其人却专意攻击杨迪，岂有此理。显然，他极不满意的，是姓毛的岸英临危时怎么能钻到床底下去呢？那不是太那个了吗？

不知这个不满的人有没有一点军事常识。

在战争时期，无论何种人士遇到炸弹或炮弹的袭击，第一是跑到距离最近的遮蔽物下进行躲避；第二在附近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就低洼处卧倒；第三……（略）。这不仅是对军队官兵的基本训练科目之一，也是所有人等的基本选择。普通人如此，“不普通”的人也是如此。

那同样在房间里的三个人，为什么成普跑出来了，为什么毛高二人没跑出来？这与三人当时所处的位置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瞬时反应差异有关。成由于处在距门窗较近的地方，加之经杨迪、杨凤安的两次招呼，头脑中已经有了赶紧离开的较强意识，所以当他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就迅速地跑出了房间。而毛高二人由于所处位置可能距门窗较远，加之二人正在专心致志地弄饭吃，所以当他们也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及战友的招呼声，想冲出房间时，直觉让他们感到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一弯腰，顺势躲到了床下。这一系列瞬时的防护动作符合教范的要求，没有不当。就是现在人民防空（地震）时的自救要则，也是先跑后躲，跑不及就躲（床等家具下）。任谁也不会昂首挺胸地面对敌人的炸弹的。

既然是规范的防护动作，为何还牺牲了呢？我以为，首先，战争中的偶然性极大，子弹炮弹都没长眼，伤着谁，不伤着谁，谁也无法预料。第二，问题在于这回美军投下的不是普通炸弹，而是凝固汽油弹。如果美军投的是普通炸弹，只要其落点不是在距床很近的范围之内，那么毛高二人就可能凭借床、桌等的掩护（哪怕是微弱的掩护），增加生存的几率（还要看炸弹的当量）。凝固汽油弹与普通炸弹大不相同，这种炸弹在爆炸的瞬间，在一定的范围内，会产生一两千度的高温不说，还会在同样的范围内造成极度缺氧的状况，在这样的条件下，躲在屋内的毛、高所处的境况就极其不妙了，先是被高温灼伤呼吸道，然后窒息昏迷，最终被烈火烧焦，结果就是巨大的悲剧。

5. 关于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

在杨迪的著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有一段对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的描述，对这段描述，有人也是十分地不高兴，说：“书中对毛岸英的负面描绘比比皆是，……这些描绘，给人以毛岸英烈士是个骄横而且不

知天高地厚的人的印象。其影响也十分恶劣。”

这次的志司最高作战会议，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 38 军的作战行动，因判断失误没有能坚决地执行彭总的意图，战斗结果不理想。彭总为此非常恼火，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 38 军军长梁兴初，会议的气氛非常压抑、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毛岸英趁着会议沉闷的间歇，起身到地图前，发了一通议论。

在如此高级别的作战会上，在如此高度严肃紧张的气氛下，毛岸英的行为是极为罕见的，也是很不得体的，因为毛的言行严重违背了常识性的规矩，以他的职务身份，本没有参加这样会议的资格，更没有不请自言的权力，可是他却在全是司令、军长的人群中，做出了令所有人意外的举动，实在过于唐突。知道他身份的人（彭总等）不好意思制止他，不知道他身份的人，不敢制止他——彭总都没说话呢。但是，惊讶、奇怪和疑问则肯定是每一个与会人的共同心理反应，因为这小伙子的表现实在太出格了。

杨迪自 1940 年初即调入军委作战局工作，是老参谋，老机关了，深谙这种司令机关工作

的规则和纪律，毛的行为让他实在无法理解，也看不惯，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没有什么不对。我想，只要没有偏见，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一定会有想法的。如果有人心里没反应，以为正常，那才是不正常的呢，而且是很不正常！

至于杨的描写是否是“负面的”，那就是个人的感觉了。杨的描述是客观的，毛的行为是自己做出来的，做什么样，人家就感觉什么样，怨不得什么“正面”“负面”。毛岸英是普通人，就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有他自己的特性，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优点缺点共存一身，不是这样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我倒觉得杨迪的描写挺好，把一个敢说敢做又不那么世故，率真又带点儿调皮的毛岸英，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多好。

四

最后再说说杨迪亲笔所写的书吧。

有总是鄙视、贬损、辱骂杨迪的人说，“杨迪的这本回忆录从文字来看，可读性十分强，

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从作者的年龄及回忆录的篇幅来看，以自己亲自动笔完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极大。”

哈哈，到底还是说了一句公道话，杨迪的书的确可读性十分强，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但是，这书还就是杨迪一笔一划地亲笔所写，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才真的为零。你真是太“孤寡”了，太小看人了。

看看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前言中的字迹：

“我已经写了一本《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本《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都没有请人题写书名、题字、作序，而是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让历史去评说。”

“还有一点，我虽已年迈，但写每一本书，从来不请人代笔，我也没有学会用电脑打字，仍然是亲自一个字一个字地坚持写。这样，我慢慢地写着就能很自然地回忆起当时的历史情景，带着感情写出来，会更真实。”

事实正是如此，做为杨迪的亲属，我们是亲眼看着他起早贪黑，不顾年老力衰，不顾重病缠身，一个字一个字地，耗时5年，写出了

总共一百多万字的三本书，了不起啊，真正的了不起！绝对的呕心沥血！！我们曾想帮父亲修改文字、语法，润色文采，可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不用，我就是要保持我的本色，显示我真实的水平，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杨迪（三本书的内容，基本上记录了他半生的足迹）。我们无语。

顺便说一句，杨迪的三本书上市发行后获广泛好评，供不应求，已经三次印刷，总数达四五万册。

正是由于杨迪的如实记述，留给我们以及后人那么多生动、鲜活、实在、平凡、伟大的人物形象：彭德怀、叶剑英、陈毅、陈赓、李克农、邓华、洪学智、赖传珠、韩先楚、梁兴初、伍修权、郭化若、安东、丁甘如、徐国夫、龙桂林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毛岸英），还有我军革命战争时期质朴的物质生活和浪漫的精神生活（将军们喜吃白斩鸡，更喜跳交际舞），多生动的记述啊！看到这些，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杨迪吗？他的记述难道不比那些充满官话套话的官样文章有意思得多吗？珍贵得多吗？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杨迪、成普、杨凤安、

赵南起、毛岸英、高瑞欣，还有杨根思、邱少云等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志愿军的英雄和烈士，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怀念！真没必要为了某种目的去刻意地拔高一些人，再刻意地去贬低另一些人，然后相互攻击、谩骂，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还是歇了吧！

2010 年 12 月 27 日

林克：毛泽东和江青分居真相

（林克，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

注：中共正规媒体发表的毛的秘书林克的回忆录，具有权威性。其实，文革前毛就和江青分居了，请注意秘书在回忆录中说的一句话：

“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此

话意味深长，毛当政后，交际从来就很广泛，不是六几年才开始的。而六十年代初期，是中南海里舞会最多的时候。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资料图）

“主席结婚，惊天动地。”

1938年11月20日，从贺子珍出走苏联后当了近一年单身汉的毛泽东，与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演员蓝苹结了婚。也就在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战斗机的轰炸。于是民间就

有了这句名言，而毛泽东的家也连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婚后，这个叫蓝苹的女人改名江青。30年后这个名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家喻户晓。

蓝苹是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于1938年8月下旬来到延安的。来到延安后，蓝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中央随即对她进行了审查。随后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在这里遇到了当年她母亲在诸城帮佣的张家的二少爷、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他乡遇故知，蓝苹似乎找到了一个“靠山”。

这年的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剧队和延安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联袂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蓝苹也参加了这次演出。演出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出人员。蓝苹就是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45岁的中共高级领袖毛泽东和刚刚来延安才一年的24岁的蓝苹结婚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但这件事情并不简单。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处理也十分慎重，还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

对此，毛泽东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

他的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谈话时，曾讲述过当年中共中央高层是如何处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说：“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 12 点半，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内容如下：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七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从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他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而且确实按照“约法三章”中所规定的，江青没有“参政”，也没有怎么“出头露面”。但事情在胜利进城以后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而那个“约法三章”实际上对江青已经渐渐地淡出了政治的视线，没有什么效力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奔赴苏联访问。就在这个时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应该说这个要求很正常，毛泽东同意了，但却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

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上午四时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数百件。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一是“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并且规定只能“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二是必须征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廖鲁言同志的同意；三是“到新区后注意

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最后，毛泽东又补充一句：“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江青按毛泽东的要求，征得刘少奇的同意和廖鲁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区”，而且确实没有给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带来什么“麻烦”。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林克在自己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分析说：“江青在政治上善于察言观色，投毛泽东所好。她利用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发展的‘左’倾思想。毛泽东在 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问题比较严重。江青不断提供假情况，所以毛泽东强调注意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江青利用了这个时机，大抓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摘自《解放日报》）

刘伯承元帅怕看战争片

周尚钰曾经是北京医院第一保健办公室的首长保健医生。第一保健办公室，负责的是除中南海以外的所有四副两高领导以及军队元帅大将的保健工作。那时候，解放军 301 医院还没有接受保健任务，所以连部队的高级领导人，也是在北京医院进行治疗。

在军队领导人中，刘伯承元帅给周尚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刘帅这个人非常好，他始终保持着军人作风。我每次去探视或给他治疗时，一见面他就会给我敬一个礼，使我非常感动。”

刘帅留给周尚钰的一个特殊的记忆，就是他看电视从来不看战争的场面，一旦电视中出现战争的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而且随后脸上会流露出非常难过的表情。

刘伯承后来大概看出了周尚钰对此的不解，就对他说“你不知道，我们是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在不是与外国侵略者作战，而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死伤的双方，都是中国的老百姓家的年轻后生。因此，每一个大的战役前一两个星期里，我们都是在那里研究如何作战，一方面要研究如何战胜国民党；另一方面还要研究怎样才能把双方死亡的人数降到最低限度。你想想，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一家都要悲伤，那背后是一家哭啊；同时还会给这个家庭的生计带来怎样的损失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

少家庭啊？所以在战前，我们花很多时间考虑的不仅仅是战胜敌人，还一定要考虑减少伤亡。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就不愿意看、怕看战争的场面。”

当周尚钰追溯这段往事时，笔者的心也久久难以平静。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特别是我们这些男孩子，还曾经以不曾经历战事，永远失掉了驰骋疆场为憾事。如今的我们的后辈们，更喜向电影中、游戏中的战争硬汉顶礼膜拜。但真正的叱咤风云的军人、战神，他们的人心竟是这样的，这与我们这些非军人的推臆是何其遥远。

周尚钰记得，当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能够看到美国记者写的新闻稿，因为这些新闻稿到处散发，各报登载。其中多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的报道、描述，在周尚钰当时的印象里，在诸多军事报道中，美国记者对刘伯承的评价是最高的，总是称他为“帅才”。

也是在与刘伯承的接触中，周尚钰得知，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候，刘伯承曾寻找了许多苏联的相关军事著作仔细翻阅，了解在

寒冷的高原作战的情况和经验，以防止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战士们造成的伤害。

（2006年1月10日《北京青年报》王凡东平）

刘伯承儿子谈父亲

刘太行（少将）：父亲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解放初，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我父亲的词条，“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父亲看到后，毫不犹豫就把“军事家”三个字勾掉，改成了“军人”二字，他说，我就是一名革命军人。

1955年，海陆空三军授衔，父亲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可他因为身体不好，加之忙于军事学院的种种事务，最终缺席授衔仪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般不谈自己的历史，要讲也只是只言片语。比如我们小时候不好好读书，他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再比如说淮海战役对他来讲应该是很光辉的事，我去问过他。结果呢，他根本不回答这

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就要死人，我所想到的是多少白发苍苍的母亲找我要儿子，多少年轻的寡妇找我要丈夫，我心里很不安哪！我今天能够当元帅，有多少人在底下呀！”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得意洋洋地讲这个仗打得多么漂亮，那个仗打得怎样。

朱和平：

文革中爷爷挨批真相

（朱和平，朱德孙子，解放军将军）

关于朱德在文革中的境遇，各种历史资料一直都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的。有记载指，当初林彪批朱德是“黑司令”时，毛泽东直指：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但是，为何当初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有要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还有“附和者”称朱德要

“黄袍加身”呢？

据《党史博览》记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说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也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到底遭遇了什么

据朱和平《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记载：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

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

“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

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 1965 年 12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

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

朱德批斗会记录

由《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的记载来看，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厉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那些“随声附和”的人又是谁？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

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厉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 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 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

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样的安排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进行的，所有与会人员都必须表态，人人过关。此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他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毛要发动一场攻势，重重敲打一下朱德，目的在于警告全体大员——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师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不过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会议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中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

尹曙生：

安徽大饥荒中人吃人真相

（本文作者尹曙生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 400 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

1961 年 4 月 23 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 1959 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 起，其中阜阳专区 9 个县发生 302 起，蚌埠专区 15 个县发生 721 起，芜湖专区 3 个县发生 55 起，六安专区 5 个县发生 8 起，安庆专区 2 个县发生 2 起，合肥市 3 个县发生 201 起。

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宣城县发生的 30 起特殊案件，有 28 起是 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2 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 10 个县 1960 年共发生此类案件 619 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 512 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 105 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 2 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 8 个县共发生 10 起。这类案件约有 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

据蚌埠专区对 819 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 59 人，敌伪人员、兵痞等 49 人，学生 19 人，农民 764 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 1144 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 36 起，其余 1108 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

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

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

全省 1289 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 136 名，劳教 153 名，拘留 881 名，判处死缓 2 名，合计占 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 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的，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 5%至 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 18 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

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

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 63 人，关死在监狱里的 33 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 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 年 5 月 13 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

发生人相食案件 300 多起。

来源：北京《炎黄春秋》杂志 2009 年第 10 期

注：《炎黄春秋》杂志，是由中共党内一些有良心的高级干部退休后主办的反映历史真实的杂志（社长是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作者包括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高级干部，习仲勋曾为该杂志题词：炎黄春秋杂志办得很好），因史料翔实，来源可靠，披露的历史真相触目惊心，2016 年 7 月整个领导班子被全部下课。该杂志现在已经完全失去原先风格。

尹曙生：

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4 年第 5 期



**毛一手操纵的镇反完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
超级大屠杀**

国共内战双方总共也没有死 70 万人

按：“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杀戮运动。对象是内战留在大陆的失败者，包括国民政府的原党政军体制人员及“阶级敌人”。毛曾宣称镇反“杀了七十万人”包含有知识分子。本文作者系中共省级公安干部，材料均有史料依据。本文翔实记述 1950—1951 镇反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如何无法无天、按比例、按数字杀人的决策内幕。镇反杀人数已超过四年内战国共军队的死亡数。而毛

的嗜血本性至死不改。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指导下召开的。尤其是1951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更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公安部原来计划于一九五一年六、七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汇报、总结自“双十”指示下达以来，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布置第二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任务。但是，在五月初，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明确告诉他，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必须马上紧急召开，不能等到六、七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提前于五月十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

议决议》。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

一九五八年，罗瑞卿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九年公安工作时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我们公安工作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对于巩固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防止和及时纠正错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于整个肃反斗争来说，我们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而又没有犯扩大化错误，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罗瑞卿如此高度评价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因为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下称“决议”）的内容直接有关。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决议”的主要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决议要求控制杀人比例

“决议”明确要求：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加以收缩、休整，在四个月时间之内，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捕、办外，暂停捕人、杀人；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收回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后捕人、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特别要求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

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出来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布置了清理积案，组织对罪犯劳动改造，为国家创造财富等其他内容。

“决议”为什么要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刹车呢？那是因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二百多万人，杀了五十多万人。进入五月份，大规模捕人、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领导镇反运动的各级党、政、军干部中，特别是地专和县以下干部，普遍弥漫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不少地方已经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据调查均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错捕、错杀了一些人。如不紧急刹车，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错捕、错杀，后果将不堪设想。

镇反四个月杀人五十万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资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 1954 年 1 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 262 万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 71.2 万余名，关了 129 万余名，先后管制了 120 万人，教育释放 3.8 万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 3 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50-10 至 1951-9；第二阶段为 1951-10 至 1952-9；第三阶段为 1952-10 至 1953 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 75%，按 71.2 万人计算，即有 54.3 万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 1951 年 1 月开始，而高潮在二、三、四、五四个月，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

十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

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镇反大批杀人风源于毛泽东

那么，草率从事，大捕、大杀，错捕、错杀这一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一些领导人束手束脚，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毛泽东批评了“宽大无边”这一倾向。中共中央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双十”指示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逼供信，严禁肉刑。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

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许可权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毛亲自向各地下达杀人指标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的：

1951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一百六十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五千多人，杀了五百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

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毛指示上海南京要多杀大杀

1951年二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

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 2 月 3 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千五百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千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 年二月二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 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六百七十五人，第二天（18 日）公开枪决五十八人；3 月 7 日夜又逮捕一千零五十人，25 日公开枪决一百九十九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 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一百五十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一千五百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

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一千零六十八人、处死一百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一万人，杀三千人，关四千人，管（制）三千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八千三百五十九人，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二百八十五人，5月9日再处决二十八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二百八十四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

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黄克诚提议收缩镇反毛不理睬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 1951 年 5 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十八万（188679）余人，处决了五万七千（57032）余人，其中广东 4 月 1 个月即处决一万（10488）余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三十五万（358000）余人，处决了十万（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二十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这种捕、杀无序的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党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

之一为妥”。（因为山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笔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一捕杀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

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并把处决人犯批准权收归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达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这四个省又处死了五万多人，且大多数没有经过省委批准。由此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纠正大捕、大杀的无序状况，还得毛泽东亲自出马，发指示纠正才能见效。

杀人失控欲刹车难以执行

毛泽东对杀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失控的状况开始感到担忧。4月20日，他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要求控制杀人比例：“虽然二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是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

力”（就是说，如果这三区按原来计划杀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点五，就可以少杀十五万人以上，而实际上都超过千分之一，如果达到千分之一点五，则多杀三十万人——笔者）。

“贵州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

（以特殊情况为由，允许贵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标，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突破指标多杀也没有关系，纠正错误不坚决——笔者）。接着，他电告华南分局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广东、广西和广州市——笔者）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由于允许贵州突破指标，他的这一指示，华南两省一市也不会坚决执行。

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人、杀人风，必须立

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刹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 1951 年 5 月统计共拘捕人犯三十五万八千名，杀了十万（100840）余名；到了 1951 年 10 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四十六万（468385）余名，杀了十三万余（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十一万人，处决了四万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 1951 年初那几个月捕人、杀人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毛时代的运动都是镇反运动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一千一百零七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八十一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

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十六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

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十六人拉到刑场枪决。这十六人中有五个伪保长，四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三个宪兵，二个一贯道坛主，六个地主。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十一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布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

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1980 年：

四千老干部评价毛泽东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0 年第 4 期，作者：郭道晖，原题：《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1980 年 3 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 20 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后，于 1980 年 10 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 40 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 1980 年 10 月 13 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 1000 人，地方、省军级干部 3000 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 256 人，国家机关有 446 人，军队有 373 人，共分成 35 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 16 个组。（据事后

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 5600 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 1548 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 30 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列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一、对文革前 17 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 17 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

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

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

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坏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

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 1957 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写为“国 1-1”，下同）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 60 页 13 ‘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

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 13-13）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 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 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 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 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 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 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 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 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 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 1964 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 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 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 5-30）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 28 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 27 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

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2. 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3.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4.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5.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

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¹

6. 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颀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

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进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

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 8-27）

李颀伯说，1959 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 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 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

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

如 1953 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 1959 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 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

诿过于人。譬如 1945 年 8 月 13—16 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 8 月 25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 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 1951 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

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 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 AB 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 年第 2 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

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 16 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他说 1957 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 年毛主席才 65 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 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 1959 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 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 7 月 11 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 1958 年有些事他有

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 10-14）1957 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 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

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于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 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 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

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官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

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譬如，对草稿第 15 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 20 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

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一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

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 以阶级斗争为纲；2. 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论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

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 70 岁的老同志陶白说：

“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 1937 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 1980 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

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

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摘自《炎黄春秋》2010.4期）

廖伯康：

四川大饥荒饿死一千万人

（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曾任重庆市委书记）

林雪/文

2011年09月15日11:06 来源：[《文摘周报》](#)（人民日报社人民网几天后转载）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

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 2870 亿斤，比“大跃进”前的 1957 年下降了 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 1959 年到 1961 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 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 231 亿斤，比 1958 年的 449 亿斤下降了 218 亿斤，甚至比 1949 年还少收 30 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 1959 年至 1960 年三年就外调 157 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 年 11 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

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

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

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 400 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 800 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 1000 万。”

“1000 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 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 6236 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 1957 年的四川人口是 7215.7 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 1957 年到 1960 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 1960 年的数字，从 1961 年到 1962 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 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 200 多万；1962 年 3 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 1959 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

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 250 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 1000 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 年 6 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

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 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 1959 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 1961 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

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

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

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 1962 年的 7 月 2 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 17 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 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 年 8 月，距离“七千

人大会议”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

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刘亚洲：

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

（刘亚洲，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曾任空军政委和国防大学政委，上将，本文是他在昆明时在成都军区空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的

讲话节选)

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

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

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

软弱。

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 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 Mao. ZD 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

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

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

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Dengxp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9.11"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 government）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 government 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

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

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

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

"9.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

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

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

理由去焚烧它呢？

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 EXIT 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 KB 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

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 767 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 KB 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 KB 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 KB 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

吴之理：

朝鲜战场上虚惊一场的“美军细菌战”

（吴之理，1937年参加新四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他历任科长兼外科医生、华中医学院教育长、师卫生部部长、西满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沈阳中心医院（第一陆军医院）院长、志愿军卫生部部长、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总后科技部副部长、空军卫生部部长等职，参加了解放淮阴城战役和抗美援朝，为部队卫生勤务工作和军事医学教育科研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下面是吴之理晚年生前关于美军朝鲜战争细菌战的回忆：

朝鲜战争停战距今（1997年）已44年，至于1952年轰动全世界，美帝国主义有口难辩的细菌战的真相如何？

答案是一场虚惊。

当年党中央是确实（至少开始的时候）认为美军是进行了细菌战，我们动员了全军和全

国，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反细菌战运动，美帝国主义也是一时臭名扫地，原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1952年末调任欧洲盟军司令，到达机场时，群众骂他是瘟神，一时下不了台。他说凭上帝之名发誓，美军没有进行细菌战，才让他走。

事件的缘起是冬季的雪地上出现大量苍蝇和跳蚤。后来知道是雪蚤，不是人蚤，朝鲜语称 oguli，是冬季雪地自然现象。雪蚤是弹尾目(Collembola)黑跳虫属(Isotomapatulustris)。我东北也有雪蚤的报告。那时我们以为雪地上不可能有苍蝇和跳蚤，加上外国报纸报导日本细菌战犯石井来朝鲜前线调查美军不明死亡，于是中央判定美军进行了细菌战。

事件的主要经过如下：1952年1月29日，志愿军卫生部和志愿军司令部收到42军电报称：美机于1952年1月28日飞过平康郡该军驻地，战壕雪地上发现多种昆虫，内有蚤、蝇和类似蜘蛛的昆虫。42军送来23个跳蚤（雪蚤），33个苍蝇和类似蜘蛛的昆虫标本。我们化验室进行培养，没有发现致病菌。42军卫生部部长是高良，是我在三师时卫校的教育长，

一个很细心和有水平的卫生干部。他一定对细菌战有所警惕，才发这个电报。42 军的电报同时报志司，引起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重视，转报党中央，又电告各部队警惕和要及时报告类似情况。一时几乎所有部队都有类似发现的电报（两个月中有近千次报告），报告敌投的东西是五花八门，有死鼠，有苍蝇，还有大蚊子，有昆虫容器（是美军撒宣传品用的铁四格弹壳和带降落伞的纸筒），有树叶和蛇，还有一两个单位报告有朝鲜居民突然死亡；报告河中漂来大量死鱼，并送来 10 余条小死鱼（鲫鱼）标本，经细菌学培养出是纯沙门氏杆菌。《人民日报》又报导美机多次侵东北投撒细菌、死鼠和其他东西，恰巧此时，美军前线发现不明死亡，美军派日本细菌战犯、原 731 部队的头头石井来朝鲜调查此事，并公布此消息。党中央根据以上情况判断美军进行了细菌战。不几天，1952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消息，发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政府的名义，谴责美帝在朝鲜和我东北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并附有投撒物和细菌涂片的照片，在全世界引起震动和纷纷谴责。事先我们并不知《人民日报》

这么快公布。公布后，我对卫生部朱直光副部长（已故世）说，这下我们要被动了。朱说今后只有做文章。

中央卫生部是贺诚副部长当家，他在东北工作过，知道日本的 731 部队是搞细菌战的部队，知道石井其人其事，是他的错误判断，党中央同意了。他派昆虫学家何琦教授和细菌学家魏曦教授（二人均故世）来朝鲜调查。他们来前，我们已多次派员（包括我本人）到报告单位去核实情况，结果是雪地上有昆虫和其他投撒物，但未发现突然死人和可疑病人，前报死人的单位说是道听途说的事。至于苍蝇，几乎家家灶前灶后都有，它们可随时飞到门口雪地上。

我个人分析：（1）帝国主义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细菌战也不例外。（2）但严冬不是进行细菌战的好季节，天冷昆虫活动能力弱，也不利于细菌繁殖。（3）在前线战壕一带投，人烟少，有病也难传染，而且离美军战壕不过数十米，还有反弹的可能。（4）朝鲜本有虱媒传染病流行，城镇房舍多被炸毁，百姓都住防空洞中，生活很困难，朝鲜民族极顽强，

再来个细菌战也不会有更大灾难迫使他们投降。

(5) 我们的初步调查尚不能证实美军进行细菌战。我向洪副司令汇报我的看法，他同意我将意见发报报告彭总和中央，我并建议暂勿大事宣传，以免将来被动和浪费人力物力。(这是何、魏二教授尚未来到前的事。) 中央即来电批评我警惕性不高，说就是敌未进行细菌战，也可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后来何魏二教授下去作了调查，并看了昆虫标本和细菌涂片。何发现所谓跳蚤是雪蚤，魏发现雪蚤染色涂片是有形如鼠疫杆菌的细菌，但呈格兰氏阳性（鼠疫杆菌是阴性），也培养不出鼠疫菌。我问他们的看法，何琦说(原话)，“我看是 false alarm(虚惊)。”彭总看到我的电报后，要我当面汇报。洪副司令要我如实地向彭总说说我的看法。

恰巧，朝鲜人民军防疫局的金局长奉命来找我摸摸底和商量如何办，因为他们也拿不出证据。我带他一同去见彭总，希望金能作个找不到细菌战证据的旁证。当晚到了桧仓郡志司所在地。(我们住成川郡，离志司大约两小时的汽车路程。) 彭总、邓华、宋时轮副司令等十余人在座。我汇报了我们调查的结果和上说看法。

彭总严厉地说（大意）：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志愿军的健康能有保障吗？他接着说，还有人反映你们对伤病员不关心，战场上死一千死一万都可以，下来后死一个，我都找你算账。我说，我可以不当卫生部长，我别无所求，但请让我留在朝鲜打仗。彭总宣布临时休会，常委讨论。

复会后，彭总说，常委们还要你当卫生部长，好好干，成立总防疫办公室，你当副主任（邓华的主任）。和金局长回志后的路上，他说他当时吓得发抖，以为真要杀头了。又说你们彭总真好，他爱兵，对你又教育又器重，你们有好党，好司令。回到志后，向洪副司令汇报，包括彭总和我个人的谈话内容。洪不吭声，说你好好干吧！不几天后，东北军区卫生部戴正华部长（已故世）受军委卫生部之托，来检查反细菌战工作，我向他汇报彭总的指示。戴说，你不要怕，就按彭总说的去做。当日半夜，我接到驻志司的苏军参谋团长的翻译的电话，说斯大林问细菌战是否真有其事。我答，你去问彭总，挂了电话。我心想，真难办！搞不好真会杀头，要有个杀头的精神准备。

过不几天，贺诚和宫乃泉组织一个连何琦和魏曦在内有 30 余人阵容强大的防疫检查队来朝协助反细菌战，他们之中有：昆虫学家何琦、跳蚤专家柳支英、寄生虫专家吴光、包鼎丞，细菌学家魏曦、陈文贵（鼠疫菌专家，抗战时证明过日军投撒鼠疫），方亮（朝鲜族），谢知母、郭时钦、程知义、病毒学家郭成周、流行病学专家何观清、俞焕文、立克兹小体专家刘维通（也是流行病学专家）、青年科学家 10 人左右（任民峰、吴滋霖、胡介堂、李义民、李振琮、高韵调、刘育京等）摄影师和技术员 10 余人。】

我领他们组成 4 个组，最大的组放在卫生部附近，另 3 个组放到东、中、西三条线的兵团卫生处。这 3 个分组担任从基层送来的标本的初检，并负责到现场指导防疫工作。初检有问题的标本，送到成川大队本部作二检。标本是收到不少，有好几百份，也培养出病菌，但都是沙门氏菌之类，未出现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有 1-2 次在树叶标本中，查到炭疽杆菌。所谓大投撒物，形形色色都有，但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

我很快拟定了反细菌战的措施（加强个人卫生措施，注射多种疫苗，每人要扎裤腿和袖口，毛巾围颈，设对空监视哨，采标本送检方法，就地扑打空投昆虫，撤销毒药，发现可疑患者先隔离后报告等），颁发全军，并取得彭总的同意，可以对死者尸解（由志军和志政联合通知全军），对后来研究伤亡原因，开了绿灯。

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由于讲究卫生，病号减少不少。当时一些部队领导干部，1987年遇见我的时候说，美帝搞这么大的细菌战，我方竟没有一名死者，那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们忙于接待调查团，李德全和廖承志领的国内名人的调查团，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和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后者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他很有这方面经验，曾任伯力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的医学专家。他带一名青年英文翻译可华斯基先生。团员有巴西生物学蝙蝠专家贝索亚教授，法国兽医专家马戴尔教授，瑞典临床化验家安德琳博士（女），

意大利生物学家奥利佛教授。我过钱三强博士担任联络员，陈述医师担任俄文翻译，热带病学专家钟惠兰博士和（妇科）严仁英教授（女）担任英文翻译。

前两个调查团，一个全是中国人，当然全力合作。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员，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们讲什么他们都认真记下，都骂美帝国主义。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就不一样，虽然他们是相信美帝进行了细菌战，但我们不能在证据上出一点问题。苏联茹科夫院士是受托与斯大林。他真行。他们来朝鲜的时候，正是美军对平壤进行大轰炸之后，平壤一片瓦砾。调查团先在东北调查美机在那里投撒细菌的证据（7月12日至7月25日）。入朝之前，茹科夫院士对他们说，朝鲜是战场，很危险，我们不妨对东北调查结果作个结论，签个字，免得万一有意外，我们劳而无功。其余的团员认为有道理，于是写了美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初步结论。在朝鲜（7月28日至8月1日），他们被安置在深深的地下旅馆，夜晚还受到美机的骚扰。开听证会那天，朝方先作两个案件报告，一个是霍乱病死亡例，说是美机在平壤大同投

下草包，内有带霍乱菌的蚌（文蛤），患者吃了蚌，得霍乱死亡。朝鲜多年没有霍乱了。另一个案例是鼠疫死亡，说是这家人某天在水缸表面发现了跳蚤，很奇怪，过了几天，家中有人病故。尸解是鼠疫。朝鲜从来没有鼠疫。（这是朝方请教陈文贵教授准备的案情，和他 40 年代日本在常德投撒带菌的跳蚤，在水缸中发现的情况相似。）志愿军拿出的是 20 兵团驻地两名中尉在砍柴时发现秘密的跳蚤群，他们收集了不少，送来培养出鼠疫杆菌的案例。由于我们在反细菌战时，要求每人都要束紧裤腿和袖口，及时对投撒现场消毒，故该军无患者和死亡。此事件很顺利地被科学家接受，通过了证词。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是，跳蚤是在森林里的小茅屋里发现的，小屋里有柴草和杂物，适合跳蚤的繁殖。这就很难说是美帝投的。他们上报的时候，没有提到小茅屋。这次要他们出场作证时，他们中一人说，毛主席教导他不要说谎。僵住了，怎么办？只有说服他服从当前的对敌斗争，把发现跳蚤的地点说成是露天。蚤标本都是人蚤（*Pulex irritans*）。至于鼠疫杆菌，那好办，我们使它出现了。

大约在5月间，陈文贵在我们检验队的细菌室打电话告诉我说，方亮把敌投的鼠疫杆菌菌种丢了（原来是方亮负责细菌室，实际是从来没有过鼠疫杆菌菌种）。陈文贵在印度索克教授那里专门学过鼠疫，一下子就发现了。我意识到是大问题，马上发报给北京的贺诚部长和东北的王斌部长，说即派门新同志来取鼠疫菌种，一定要给，不然一切都不好办。门新（后来在辽阳203军医院当院长，已离休）去沈阳，在回，5天，取回两管鼠疫菌种（装在密封的铁管里）。我把一管交陈文贵，一管当我们防疫队副队长李哲范的面交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他向我要过菌种，这时他心中有数为何我给他菌种。事后我对李哲范说，万一到时难证明细菌战，你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他说，那不行，总有办法可想。可见当时压力之大。李是朝鲜族，解放前和苏联专家在东北一起搞过防鼠疫工作，已是出色的专家了。早几年我问他记不记得此事，他说记不太清了。

这一年里，我跑了三次北京，汇报有关反细菌战问题。每次都见到周总理。周总理虽日

理万机，对此事过问非常之细。一次，朝方保健副相和我同去北京，向总理汇报对国际科学调查团的准备工作，总理问朝方有何困难，我插了嘴，总理马上问鲁副相对我的意见是何看法，使我非常感动总理尊重别人的高贵品格，同时使我感到我不该随便插嘴。一次，晚上8点多钟，总理一面吃饭一面和我们谈问题。他就吃一小碗饭，两小碟菜，一荤一素，一小碗汤。多简朴的生活。

调查团回东北前，去朝鲜北边碧潼战俘营会见美空军几名飞行员，他们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们投细菌战的经过。这次他们又自由地向调查团谈他们听过投细菌武器的课和投“不爆炸的炸弹”经过。停战后，他们被交换回国，美军审问他们为何乱说莫须有的细菌战之事。他们回答说，中方答应很快放他们回国。听说他们都为此受了处分。我真佩服战俘营我方人员的说服工作。

调查团回到北京，签了字，发表了500页厚的黑皮书《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毛主席接见了他们。

国际科学家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说，我看美帝国主是实验性的搞细菌战。他们异口同声赞同这样的说法。

茹科夫院士回苏联向斯大林汇报后，苏共中央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周总理马上找黄克诚总参谋长和洪学智副司令问，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当时，我国正派人在欧洲作反细菌战宣传，总理即下令撤回。之后我国再不提此事，但下面并不知道。一些编书的人老要把美帝国主搞细菌战写进去。我总是建议用我们受到细菌战的“威胁”的口气，把文章做在“防”的方面。

黄克诚兵中要我向军事科学编百科全书的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说美帝没有在朝鲜搞细菌战，现在两国关系也不坏，不宜再说这个问题。他们听到之后，派人来问我究竟有没有细菌战。我只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没有别的，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让他们都签了名。也许我还是太天真，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如是这样倒罢了，如不是这样，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曾不止一次向黄克

诚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而且一开始你就表示了你对细菌战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尽到责任了。；

我想这件事在历史上总有一天要说清，现在由我这不在职的知情的 83 岁的老人说出来比较合适：1952 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此文原载北京《炎黄春秋》杂志 2013 年 11 期）